

# 秋风 探索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诠释



秋风这两年来对儒家与传统的讨论,引人关注。

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

## 【图书简介】

### 《华夏治理秩序史》

近代以来,传统与现代两种学问分野,激烈对立。秋风(姚中秋)欲重写中国史,改变这一状况,其新作《华夏治理秩序史》,主线即是溯源重寻儒家的自由传统。

秋风认为自尧舜以降五千年间,中国社会体制发生了几番巨大变化,但其间形成了两个相反的传统,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,前者代表自由的传统,后者则代表压制的传统。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演变,就是这两种传统,以不同比例搭配组合的结果。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坚守下来的是自由的传统。

自清王朝进入历史帷幕后,中国一直艰辛探索以自由民主为归向的社会秩序,但思想资源多是借助于国外。秋风《华夏治理秩序史》含有这样的期待,将中国儒家的自由传统,引入当下制度探索的过程之中,为中国现代的社会转型提供本土思想资源。

“不管你喜不喜欢,中国思想界充当西方常识传播者的时代已经结束,中国思想之主体性正在重建中”,《华夏治理秩序史》正是秋风为“重建中国思想主体性”努力的成果之一。



《华夏治理秩序史》(第一卷、第二卷)  
作者:姚中秋(秋风)  
版本:海南出版社  
2012年2月版

秋风一直将自己定位为“独立学者”,既区别于现代学院体制内的知识分子,也区别于专业化的研究者。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及译介,完成了自己知识结构的构建,并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,调整学术方向。

从不断强调法治、有限政府、自治、自由市场等理念,到直言不讳表达他的儒家价值取向,并将儒家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。秋风受关注,也受争议。

在我们的访谈中,秋风自己对此的回应是,“我没有发生多大的转变”,他认为,自己是通过重新解释传统,重新解释历史,来增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信心;学术关注的焦点,仍是现代中国的转型。

## 与中国的文明保持连续性

新京报:最近,广州有学者撰文批评《立宪时刻》一书,认为作者高全喜先生有“以虚文为史实”之弊,文中也批评你是以偏概全地看取儒家文化,持类似批评观点的,还有袁伟时先生。

你曾仔细回应过袁伟时先生,但似乎并没有说服他,而且你们并没有处在同一个语境中谈论问题,前者以历史事实为基,而你从社会秩序的建设出发,这种交流的困境,应该是你转向儒家思想的研究开始吧?

秋风:我写过一篇文章,《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之颓势》,其中就是把袁伟时先生归类到启蒙自由主义学者之中,他的启蒙,和五四时期胡适那批知识分子一样,是通过反思传统来启蒙的。我能理解他对我的批评,但无法接受他的批评,因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。

新京报:你对启蒙,持怎样的态度?

秋风:我基本就是反启蒙的。当然,我反的是法国式的启蒙概念,以及康德的启蒙概念。康德说我们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智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缺陷:他把一个好的生活,一个健全

的理智。

但实际上,一个好的生活和一个健全的社会秩序,最重要的元素,其实应该是情感、信仰和利益。在德法的启蒙理念中,这三者都被排除在外,所以,这样的启蒙会教出疯子,教出理智上的狂人,不懂得合宜的情感,没有信仰,甚至拒绝诋毁宗教,也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。这样的人未必能做一个好公民。

我说我反启蒙,在一定意义上是想发现另外的启蒙思想传统,比如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和启蒙传统,包括中国的启蒙传统。后者的启蒙传统见之于中国《周易》的蒙卦,我写了一篇文章对其予以阐明。其基本理念是这样的,第一,不要主动启蒙别人,而是等人来求启蒙;第二,不只是知识启蒙,对于普通民众,主要用法律来启蒙。第三,有人拒绝启蒙,也是无关紧要。大多数人即使处在一个比较愚昧的状态,社会仍然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秩序。对不同的人,要有不同的启蒙策略。

新京报:近二十年来,你的思想变动很大,一路走过经济学、自由主义、哲学、法学、宪政学这些领域,而现在

你最为关注的就是你的儒家文化的研究。批评你的人,有这样的看法,认为你是以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去套儒家。

甚至有人将你与摩罗相比,视你们为近年来公共思想界发生明显转变的人物。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读者对你思想转变的疑惑与隔阂的?

秋风:因为一个人要改变自己自己的想法,包括他变到你不喜欢的立场上,他一定有他自己内在的理由,其实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。既然你在主张自由、宽容,那就应该宽容人家。任何一个社会,都会有不同的价值,知识分子也可以有不同的立场,为何一定要一致呢?

至于我自己,当然跟摩罗有很大不同:虽然他在往保守的方向走,但是他并没有回到儒家,他主要是捍卫现在的国家利益。而我完全不同,我的研究回归儒家,同时,思考的核心,还是自由、民主、法治这些东西。我谈儒家文化,就是觉得中国要建立有自由、有尊严的社会秩序,必须与中国的文明保持连续性。而儒家本身就有这样的东西,我只不过是要阐明它,用现代的语言来阐述。

## 中西圣贤,心同此理,人同此心

新京报:从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者,转到儒家的文化研究者,你改变的内在理路是什么?

秋风:我没有外界所说的巨变,其实是没有变化。中国的现代转型,是我一直以来关心的核心问题。

我大学本科学历史,因为想弄清楚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些内在脉络,研究生阶段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学史,研究对象是钱穆先生。当时就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价值取向,反激进,走保守主义的路线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,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,那时思想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,反传统,用来支持中国完成社会转型。我当时是个学生,对反传统有一定的疑惑,觉得传统不一定像他们批判的那么糟糕。当然,通过研究钱

穆,我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结构,基本理念,后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新京报:现在大家讨论儒家研究,不是从“激进—保守”,或“尊重传统—反传统”这样的层面来分析,而是质疑,西方舶来的政治学观念与中国的儒家结合在一起,其内在的合理性是什么?

秋风:现代政治哲学所设想的理想制度模型,最基本的理念,就是限制权力。当然你还可以继续给它添加一些东西,比如保障权利、民主、法治等,但核心是限权。而儒家思想里就有丰富的限制权力的理念,儒家士人也建立了诸多此类的制度。正是基于这些,我提出中体西学,资相循诱,接续中华儒家道统。我坚信,中西圣贤,心同此理,人同此心。我所做的工作,其实是一个中西互

相阐释的过程,是一个互动的阐释过程。

新京报:你这种互动阐释的前提是什么?

秋风:我认为,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立国的过程中,我们仍在努力建立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秩序,所以中国仍处在立国期,过去一百年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,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、可持续的治理秩序,但仍未完成。这是一个基本判断。社会秩序的建设不能割断社会的文化传统,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。如果不能妥善地安顿儒家,就没有秩序可言。但另一方面,现代社会秩序也离不开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。于是,问题就很清楚了: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这两者,会通中西,中西互相阐释,才有可能想象并最终构建中国的现代秩序。

(下转 C03 版)